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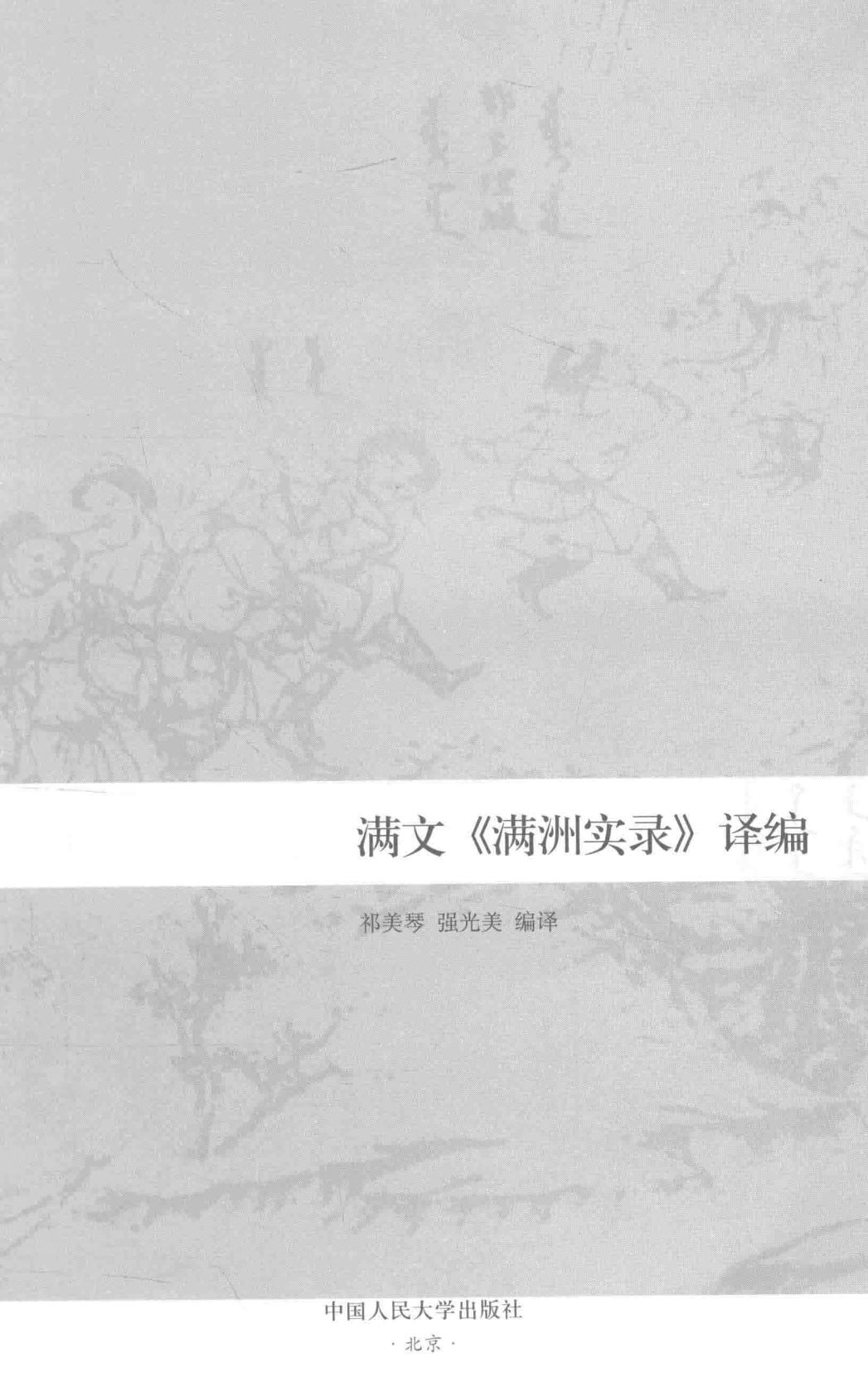
清史研究丛书

# 满文《满洲实录》译编

祁美琴 强光美 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满文《满洲实录》译编

祁美琴 强光美 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文《满洲实录》译编/祁美琴, 强光美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8

(清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21579-2

I. ①满… II. ①祁… ②强… III. ①努尔哈齐 (1559~1626) -人物研究②中国历史-史料-清前期 IV. ①K827=49②K24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667 号

清史研究丛书

满文《满洲实录》译编

祁美琴 强光美 编译

Manwen Manzhoushilu Yibia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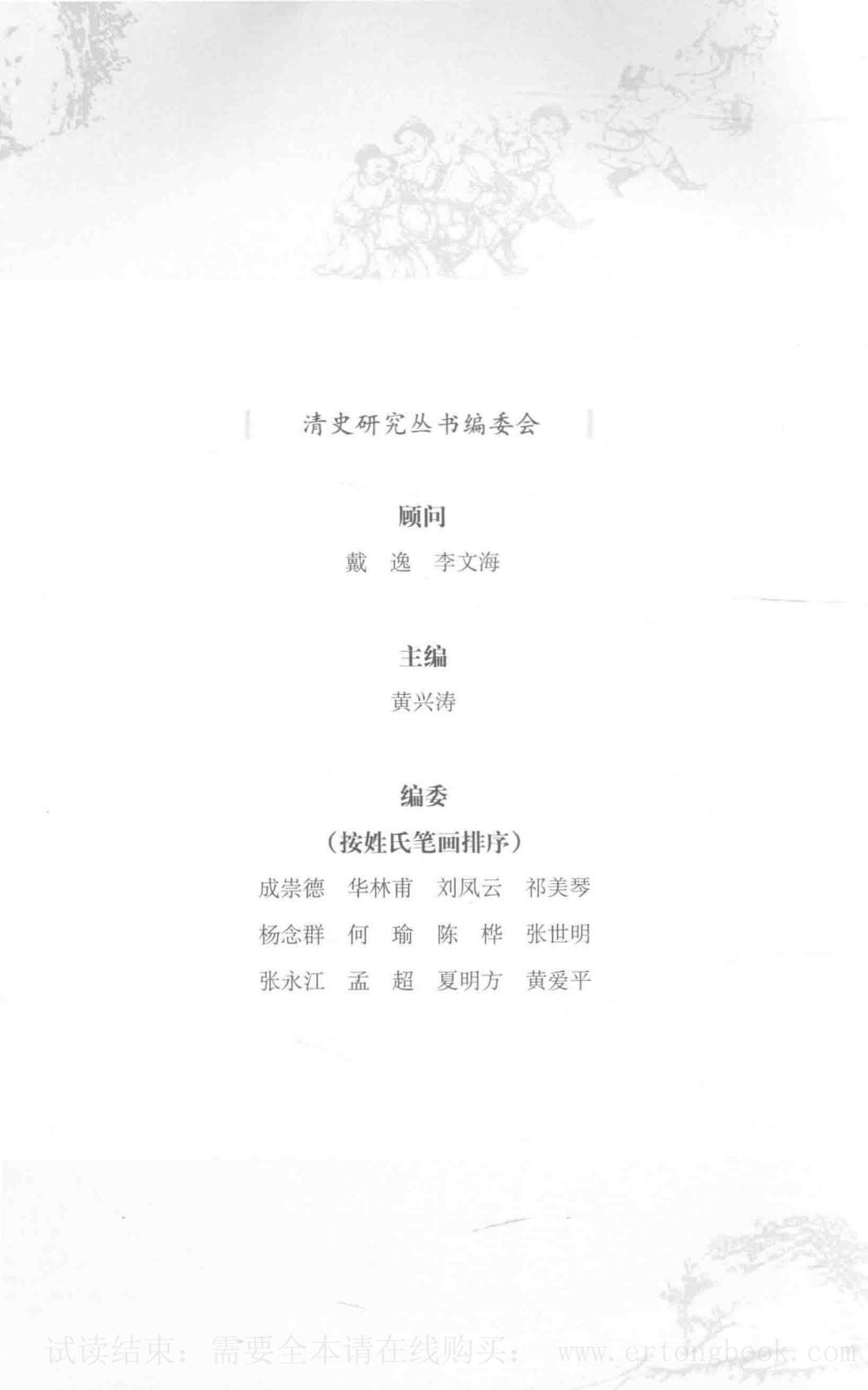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电话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5 000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清史研究丛书



##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 顾问

戴 逸 李文海

### 主编

黄兴涛

### 编委

#### (按姓氏笔画排序)

成崇德 华林甫 刘凤云 祁美琴

杨念群 何 瑜 陈 桦 张世明

张永江 孟 超 夏明方 黄爱平

《满文〈满洲实录〉译编》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770019）经费资助。

## “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史研究丛书”原由戴逸先生发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1988年开始至2001年，它曾推出《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戊戌思潮纵横论》、《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八卦教》、《明清农村商品经济》、《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晚清乡土意识》、《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乾隆帝及其时代》、《洪亮吉评传》、《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等13部力作，在清史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丛书的出版一度中断。现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协商，决定从今年起将其恢复起来。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其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中国不仅经历了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也经历了社会性质从传统到近代的深刻变革，这就决定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发生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人们常说，“中国今日之疆域版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即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民族问题，许多也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这的确是对清史研究之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极好概括。我们之所以致力于推动这套丛书继续编辑出版，其宗旨和动力来源也正在于此。

“清史研究丛书”是发表高水平清史论著和重要清史文献的专业学术平台。它强调学术的前沿性和国际性，提倡严谨、扎实的学风，崇尚史学的综合功夫，鼓励跨学科视野和方法创新。就研究内容而言，它则坚持清代前后期历史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反对将其前后人为加以割裂的做法。

本丛书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稿和审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为1972年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三十多年来，清史所的成员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均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宝贵支持、帮助和认可。2000年12月，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乃清史研究基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广大清史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0年7月

##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清史研究丛书”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高兴的一件事。这套丛书以推动清史的研究和写作为主旨，希望能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尽一点力量。

清史是个辽阔宽广的研究领域，上起 16 世纪末满族的崛起，下至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逊位。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问题繁多。离我们今天的时间较近，与现实息息相关，研究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这三百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雍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日益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巩固，文化事业兴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如果拿中国封建末期的成就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历史作比较，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国势凌替，危机四伏，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前赴后继，斗争绵延不绝，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人民冲破了黑暗，历史微露出晨曦，迎来了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

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经过了由盛转衰、由衰而复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中国已经从沉睡的酣梦中苏醒，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正在大踏步前进。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四化”的重任落在我们及以下几代人的肩上，必须团结一致，努力不懈，长期奋斗，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青春。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们为了改造现实而迈步前进的时候，经常会回顾全民族刚刚走过的路程，从中汲取力量，获致教益。人类有回忆往事的爱好，有总结过去的习性，有从自身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的潜力，有寻根的愿望，这是推动人们进步的力量。谁忘记了过去，谁就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而谁更多地理解过去，谁就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迎接和建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为了掌握中国的国情，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须在漫长广阔的历史领域中艰苦探索，观其大局，提其纲领，揭其规律；又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踏实钻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索隐探微，释疑抉奥，作认真细致的整理和剖析工作，即把综合和分析结合起来，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清代三百年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档案、官书、文集、方志、野史、笔记、传记、谱牒、契据、报刊，种类繁多，数量浩瀚。汉文以外还有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和外文资料。任何才人智士，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在浩浩茫茫的清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中窥其一角，要凭借这样繁多而杂乱的历史资料来展现漫长的清代历史画卷，这既给研究者充分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要求全体研究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潜心沉思，锲而不舍，把毕生精力奉献于钻研和阐扬祖国历史

的壮丽事业。

尽管近年来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质量有了明显增长、提高。但它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起步较晚，清史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薄弱的部分急需填补和加强，研究工作者只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必能得到丰厚的收获。“清史研究丛书”将为一切研究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这片园地将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成为绚丽多彩的盛大花圃。

戴 逸

1988年1月

# 前言

在清朝历代皇帝实录中，清太祖努尔哈齐实录版本最多，流传下来的有《满洲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三部。其中，尤以《满洲实录》最为特殊，它不似其他实录满、汉、蒙三种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体文合璧，且附带插图，形式上独树一帜，成书上也疑点颇多。正因为如此，从《满洲实录》被发现那一刻起，对它的讨论就从未中止过。以内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润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该书的研究上建树颇丰，并一度取得领先地位。在中国，台湾学者也不甘落后，陈捷先、庄吉发等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在大陆，对《满洲实录》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国时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单士元等，就对该问题予以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钟翰、秦国经、郑天挺、薛虹、郭康松、齐木德道尔吉、达力扎布、乔治忠、谢贵安、杨勇军等人先后发表了不同见解，将《满洲实录》以及清实录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 一、《满洲实录》成书问题

### 1. 《满洲实录》与《太祖实录图》的关系

《太祖实录图》早已不存，最早对其进行记录的是《旧满洲档》，据天聪九年（1635）八月八日记载：“tere inenggi sure kan, nenehe

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 be juwe howajan jang jiyan, jang ing kui de niru seme afabuha weile be nirume wajihā sain seme jang jiyan de emu juru niyalma, emu ihan, jang ing kui de emu juru niyalma šangnaha.”<sup>①</sup> 汉译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画工张俭、张应魁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的工作，很好地绘制完成了，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头，张应魁人一对。”《太宗文皇帝实录》也有相似记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酉：“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sup>②</sup>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祖实录图》（或称《太祖实录战图》）乃《满洲实录》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结论的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05年他发现了深藏盛京崇谟阁的《满洲实录》，后介绍于世，并根据《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九八年八月乙酉条的记载及《满洲实录》末尾《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通过二者的结合、对应，进而认为二张所绘《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国朝宫史续编》、《开国方略联句诗》的注释和《满洲实录》末尾注释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支持了内藤的说法。

国内学者也大都赞同此观点。徐中舒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sup>③</sup>的话。20世纪80年代，单士元在整理清代实录时说：“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sup>④</sup> 秦国经等在介绍清太祖实

① 《旧满洲档》第九册，台北影印本，4415页。

②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

③ 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8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④ 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

录纂修过程时说：“天聪元年（1627），太宗命额尔德尼等修太祖实录，历时八载，至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始将合绘的太祖实录图告成，名《满洲实录》。”<sup>①</sup>另外，白寿彝、郭康松、瞿林东、薛虹、乔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太祖实录图》与《满洲实录》是同一部书的观点。这一看法已成定论，似无疑义。

但是，2002年，对清实录研究颇有心得的日本学者松村润发表《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对《满洲实录》重绘自《太祖实录图》一说提出质疑。经他考证，《太祖实录图》只是图画本，不可能是《满洲实录》的原本，《满洲实录》是据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的，沿袭了其满文本八卷八册的样式，但并没有照录其内容，而是完全依据顺治重修本的内容绘写。<sup>②</sup>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陈捷先就通过满文清实录的研究，发现《满洲实录》的满文部分与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满文内容几乎一致的事实，他从而推论，《满洲实录》的附图部分来源于天聪末叶成书的《太祖实录图》无疑，但文字部分却是取自顺治本武皇帝实录。<sup>③</sup>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杨勇军在松村润、陈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满洲实录》不是重绘自《太祖实录图》，而是乾隆朝官方伪造的最后一本努尔哈齐实录，成书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来，《太祖实录战图》只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他同意陈捷先提出的该书内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之观点，但是图画部分则

① 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

② 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③ 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160页，台北，大化书局，1978。

“是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还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sup>①</sup>。

不过，长期以来，学界虽然普遍认同《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但是对其名称，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插图本，初名《满洲实录》，如单士元曾说：“天聪年间绘图本，原来只题满洲实录，亦未称太祖实录。”<sup>②</sup> 郭康松认为，《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是乾隆时才有的，因为该书附有插图，所以乾隆帝题为此名。<sup>③</sup>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称，《满洲实录》原名《太祖实录战迹图》，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绘写本成书时，才改题现名。<sup>④</sup> 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中也采用此观点。<sup>⑤</sup>

薛虹亦表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但是他提出该实录原名既不是《满洲实录》，也不是所谓《太祖实录战图》，而应称为《太祖实录图》才对。并且，《太祖实录图》也不是正式名称，只是对实录图文并茂的形象描述语而已，早期实录蓝本没有正式名称，“其实，从重绘《满洲实录》时称之为‘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等等，也可见原并非正式定名为‘太祖实录图’，无非是太祖的实录的图的意思罢了！”<sup>⑥</sup> 至于乾隆时期为何摒弃《太祖武皇帝实录》，突然重绘《太祖实录图》，并改称《满洲实录》，作者表示难以理解。他对

<sup>①</sup> 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sup>②</sup> 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

<sup>③</sup> 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

<sup>④</sup>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五卷，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sup>⑤</sup>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40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sup>⑥</sup> 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此次重绘改名的原因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将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满洲源流考》联系起来，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突出满洲称谓。<sup>①</sup>

与薛虹一样，乔治忠也指出“太祖实录图”不是一个正式名称。《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图”字样，只是后来对该图的一种称谓，天聪年间并无此称。乾隆朝对《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称谓有多种，如“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图本”、“太祖战图实录”等，直到重绘写本时才正式定名“满洲实录”。不过，在“满洲实录”正式定名的时间问题上，他与薛虹发生分歧。薛虹认为《满洲实录》定名于乾隆四十六年，而乔治忠则认为，正式定名《满洲实录》最早也应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的事了。<sup>②</sup>

笔者亦认为，从《旧满洲档》的记载来看，只是太宗让画工根据“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册而已，并没有提到该书的名称，可见当时还没有命名。至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出现的《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想必是后来所取。从上述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实录图》极有可能就是《满洲实录》初纂本。

## 2. 《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

与《太祖实录图》密切相关的是另一部努尔哈齐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同时也存在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两部不同的书，二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徐中舒说：“汉文

<sup>①</sup> 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sup>②</sup> 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这两部实录，都成于沈阳朝廷。”<sup>①</sup> 将它们称为两部实录。孙文良曾称赞皇太极统治时期“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是清朝的建国史，也是成文的满族勃兴史”<sup>②</sup>。可见，他也是将这两部书当成不同的实录对待。郭康松在《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一文中也判定《满洲实录》八卷成书于太宗天聪九年（1635），与《太祖实录战图》是一回事，随后又介绍《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并没有说二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sup>③</sup> 齐木德道尔吉的《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一文，细致梳理了太祖实录的纂修过程，认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实录》，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实录》。到顺治朝重修以后，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实录》。此外，他还提及，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时问世的，还有汉文、满文和蒙古文对译的、带有图画的《满洲实录》。但是没有指出《满洲实录》的具体编纂过程和纂修时间，也没有说明《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从作者的叙述中来看，似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渊源、师承关系，应是两个独立的版本体系。<sup>④</sup>

而包括孟森在内的多数学者都认同《太祖实录图》成书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之前，二者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太祖实录图》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有言：“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实录，

<sup>①</sup> 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

<sup>②</sup> 孙文良：《〈满洲源流考〉辨析》，载《社会科学辑刊》，1987（3）。

<sup>③</sup> 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

<sup>④</sup> 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